

中华文化视域下的新时代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路径初探

赵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①

近些年，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宏观变迁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一方面，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展动能略显颓势，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相对下降，其所奉行的文明优越感和自我中心主义开始被基于尊重和对话的文明观所取代；另一方面，以我国为代表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从这个意义出发，寻求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进路成为我国从世界大国到强国迈进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时代挑战和历史选择。

至于如何建构新时代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②。由此可见，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对建构国际话语权、对外展现中国形象意义重大。

一、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勾勒中国形象的本体与表征

（一）什么是中国话语体系

话语是人类言语表达的载体，是人类传播信息的工具。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即权力”^③。“因此，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对世界秩序的主导权，也就掌握了‘权力’。”^④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和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蕴含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密码、价值取向、核心理论，决定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的强弱，也是国家形象、实力和发展道路的折射和缩影。话语和话语体系为话语权服

^①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并讲话》（2021年6月1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htm，最后浏览日期：2023年5月10日。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5—46页。

^③ 转引自袁军：《提升中国核心术语国际影响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2022年4月19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2/04/19/c40531-32402402.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3年5月10日。

^④ 袁军：《提升中国核心术语国际影响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务，是话语权的基础。^①所谓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主要是指中国在长期的国际交流实践中，逐步形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系统话语表达，对外解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使中国道路、制度和理论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话语体系，即中国国际话语权。对于国际传播工作而言，“中国话语”是本体，是传播能够取得实效的根本。

（二）什么是中国叙事体系

叙事是叙事主体运用特定的叙事传播技术将叙事内容呈现给叙事对象而引发思想共鸣、达成行动共识的过程。其中，叙事主体是核心，叙事传播技术是手段，叙事内容是基础，叙事功效是目的，共同构成叙事逻辑体系。^②所谓中国叙事体系，是一套由关于中国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事件叙述所构成的，具有根本性、系统性和全局性的逻辑体系，与创作环境、社会历史语境和读者接受等都密切相关。旨在通过叙事之“道”，让中国故事更加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进而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是什么，中国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中国做了什么，中国为什么这样做，中国为什么这样做了效果很好”等问题，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美西方媒体惯用的报道技巧，就是构建对中国的负面叙事，从而疏离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工具箱里摆满了各种意识形态“斗争工具”。

（三）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关系

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作为筋骨和皮肉，勾勒出中国的总体形象。其中，话语是内容，是本质，相对静态；叙事是方式，是手段，相对动态。话语是叙事的主体内容，是一种思辨表达和价值表达，其背后是思想，是“道”。话语的不断更新成为叙事传播的资源 and 内生动力，为叙事体系创设“话语空间”和学理论证。叙事的动态堆叠、层累，形成并活化话语。叙事强调的是“术”的重要性，属于叙事体系的内核，解决的是“为什么”“讲什么”“怎么讲”的问题，为话语体系提供传播场域和逻辑支撑。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紧密关联，相辅相成，受民族性、区域性以及思维方式、语言习惯、表达方式、国情特点和文明特征的影响。

二、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建构现状

（一）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大国战略竞争充满了话语叙事。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不仅在军事和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也形成了话语霸权。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其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等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被当做国际法的基石和是非判断的标尺。与此同时，学界总结当下在西方话语叙事体系框架中存在一种现象，叫“认知中国悖论”：就是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喜欢历史/文化中国，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喜欢当代中国，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政治；喜欢当代中国政治，不见得喜欢中国政府；喜欢中国政府，不见得喜欢中国共产党。总之，认识传统中国文化，认可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就是不认同中国的体制。特别是新冠疫情暴

^① 韩庆祥、陈远章：《建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2017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516/c40531-29277537.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3年5月10日。

^② 李霞、陈志勇：《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的中国叙事体系》（2022年12月2日），光明网，https://theory.gmw.cn/2022-12/02/content_36204961.htm，最后浏览日期：2023年5月10日。

发后，西方话语叙事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①比如，打着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幌子，着重攻击中国政党制度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反复炒作涉疆、涉藏、涉港、涉台议题；在国际关系中丑化中国形象，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今，中国和平崛起已无法阻挡，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言自明，以“骂”主导的舆论战，便成为西方压制中国有限的“遮羞布”。

（二）中外话语体系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

中国话语叙事面向置身其他文化的国外受众，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思想文化，其本质上具有跨文化属性。^②“外部世界对于中国话语的认知和判断是基于其自身文化、利益、规则和价值等认知体系进行的，而这个认知体系与中国话语生产所依据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并不完全契合，甚至可能迥然相异，这种差异是造成中国话语对外传播困境的一个外部根源。换言之，外部世界对中国话语的错误认知有其文化根源，中国对外话语的跨文化性质决定了其必将面临诸多挑战。”^③比如，我们说“和为贵”、构建“和谐世界”，而西方很多人的理念是“零和博弈”，认为你发展了，就是威胁和侵占了他的利益。再如，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要过上好日子，没有准备取代谁，而是要让中华民族恢复应有的尊严和地位。然而，英国广播公司（BBC）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句话却曲解成“中国要一统天下”。中外语言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中文自甲骨文开始，沿袭了语言文字的传统，中文表述的思维有3 000多年的基础。而英文的形成只有1 000多年，且来自欧洲不同的文化传统。举个例子，在中文里人们不会把任正非说的“杀出一条血路”理解为“一路杀人，血流成河”，却有西方人的翻译就是如此，而且这种错译和恶译（恶毒的翻译）行为越来越多。^④

（三）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在跨文化视域下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其归因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建设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提供了实践基础，为升华中国理论提供了丰富滋养，中国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但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仍面临着西方话语霸权、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等挑战，与西方文化影响力仍存在差距。从更深的层次看，主要存在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话语叙事主体易受语言、宗教、制度、规范、习俗等因素影响，陷入文化身份认同困境。具有亲缘性的文化之间往往表现出较多共性，为相互交流和建立文化认同奠定了良好基础。相反，异质性文化常常诞生于不同文明，根本质态相异，从语言、宗教到风俗习惯等方面差异显著，话语互动过程中缺乏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容易造成关系疏离。第二，文化势差制约交往理性，强势文化凭借自身影响力逐渐形成文化霸权，主导文化互动进程，造成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难以实现。第三，同一个概念在不同话语体系中的不同解读体现了文化对话语的塑造作用，也为跨文化交流设置了陷阱。在话语互动过程中，话语生产者和受众都是从自身认

^① 参见王义桅：《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学术界》2022年第9期。

^② 薛丽：《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人民论坛》2020年第34期。

^③ 薛丽：《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第98页。

^④ 《东西问|黄友义：如何突破中外文化差异让世界更了解中国？》（2021年11月4日），“中国新闻网”搜狐号，https://www.sohu.com/a/499139992_123753，最后浏览日期：2023年5月10日。

知和立场出发理解和使用概念的，如果对话各方对概念本身认知不同，对话就只能流于形式，而无法达到沟通的效果。第四，话语文本的语际转换成为中国对外话语生产和传播亟须解决的又一难题。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受语言知识、社会文化、思想意识等诸多因素影响的话语实践，隐含着知识和权力关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对外话语文本的译文能否真实还原原文的意义和意图至关重要。

三、加快构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一) 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之“道”——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中国形象是否充满活力、富于张力、彰显魅力，就要取决于中华文化的功用。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和中国奇迹的成功实践，是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能够“立”住的坚实基础和丰富素材。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了价值坐标和精神支撑。其相对于骨皮之体，起到了血脉的联结作用。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才能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也就是说，中华文化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输送了滋养，赋予了能量。搞清楚三者关系，我们做工作才能更加有的放矢，找到问题根源，提出更有效的解决办法。想要构建稳固、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关键是要用博大精深的文化表征来支持国际传播话语，并以兼具道德人文观照和共同价值理性的话语内核来解构西方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绝对主义、自利主义导向下的国际舆论体系。

中华文化之所以是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核心，其原因有二。一方面，中华文明不仅是全球仅存的古老文明，而且是与现代文明融会贯通的。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众多的文化遗存、浩瀚的历史典籍、独具特色的艺术创造等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从历史的维度看，中华文明不仅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包含近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既根植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也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可以说贯通古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良好结合。正是不断积累、不断进步、日益厚重的中华文明，才是中国发展的根和魂，也是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内涵。围绕中华文化建立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对外展示中国形象，不仅是抓住本质，也是发扬优势。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独特包容性，中华文明多元通和、兼容并蓄的特点，也是构建好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基础。中华文明区域自古人口众多、邦族林立，中华文明对于凝聚人类价值共识、引导人类价值提升有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历史经验，这些理论和历史自身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本质属性。^①中华文化蕴含了可供各国国家治理参照借鉴的思想智慧，同时也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以“和”文化理念提出对待世界文明的四大原则：一是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二是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三是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四是科学对待传统文化。他强调：“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

^① 凌海青：《中华文明赋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民族学刊》2022年第12期。

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①这就有别于西方一些人推崇的“文明冲突论”，能够打破西方优越、零和思维的局限。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更能被世界所接受，更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以中国近些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例，该理念就是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哲学结合，在实践中将中国传统文明精髓外化为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展现着中国对于世界发展的新认识。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融合了中外文明的智慧成果，形成了贯通东方哲学的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王道文化，围绕着“天下大同”的王道文化核心，《尚书》提出“协和万邦”，《周易》也主张“天下和平”的政治理念，《礼记·礼运》对理想世界的表述则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而近代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更将中国传统文明价值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怀付诸了社会实践。而在西方，古希腊“共餐制”文明已经是“共同体”的思想雏形；近代德国学者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提出“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概念，认为“共同体”体现了人类关系的真正本质；英国社会学学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则强调“共同体”是人类彼此信任、互相依存的温馨家园。正因如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被广为接受和认可。

（二）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之“法”——着眼三重维度

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之“法”，即需要遵循的原则，主要有如下三重维度。

1. 坚持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中国道路的选择基于中华文明的土壤，要认识今天的中国道路选择和发展，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根本思路，把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依托。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把中国历史逻辑搞清楚，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通过传统与现代的贯通实现对中国软实力资源的挖掘和整合，构建整体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才能深刻领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从而确立中国的主体性，以更好解释“何为中国”“中国何以崛起”等国际关注的问题，破解西方关于中国负面叙事的话语霸权。

2.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中国的国家崛起，必定伴随着“中国理论”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性体现，其既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又利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根与魂”“精神命脉”“文化基因”“重要源泉”“突出优势”等多个维度，补充、拓展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内涵，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至启发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攻克诸多突出难题的思想滋养，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①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4 日，第 2 版。

3. 坚持中国与世界的统一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还要秉持的两个基本视角是中国视野中的世界和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在此过程中,理解中外差异,减少表达误差,需要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坚持世界眼光,找到一条既能说异,也能说同,“异同结合”的话语道路。不仅要强调“世界问题、中国方案”,更要凸显“人类问题、全球方案”,多反映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话语共同点、利益交汇点。离开“世界性”而过度强调“特殊性”,中国话语就会失去普遍意义,外国受众也就无法理解中国实践的世界意义。中国外文局重点围绕“全球发展倡议”“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安全倡议”“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话语和典范概念,陆续推出多语版对外话语叙事研究报告,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精髓、中国价值观念、中国全球视野和中国世界情怀,彰显中国实践、中国理论对破解世界难题的实用价值,呈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话语底蕴,就是坚持中国与世界统一、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有益尝试。

(三) 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之“术”——抓住五个关键

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在具体实践工作中还要有实施抓手和路径,其主要包括如下五个关键。

1. 建构话语叙事内容

话语和叙事离不开内容,只有话语内容丰富、生动、具有竞争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才能在国际上实现“弯道超车”。第一,要注重概念提炼,基于中华文化、秉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兼顾国际社会需要,打造更多海外民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对中国特色的简约表达。第二,要以伟大中国实践为“源头”,使基于国内发展建设实践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等理念,基于参与国际事务实践的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等理念,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源头、读懂中国的标识。第三,要以中国故事为“载体”,着力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中国梦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中国故事的表述之中,使人容易听、听得懂,进而让中国话语体系变得具体鲜活、生动感人。

2. 做好话语转换翻译

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构建,目的就是让海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能认同,这就需要充分了解外国人的思维习惯做好话语转换,尽量弥合中外语言、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提升话语的可读性。第一,要忠于原文,尽量呈现原文的立场、观点和风格,特别是对一些高度凝练概括的时政类话语表述、逻辑结构复杂的长句,首先应具有中国立场,忠实准确表达中国话语源思想。第二,要贴近受众需求,在忠于原文基础上把握语言转换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根据不同受众、语境和场合对话语进行灵活变通,追求超越文化差异的“共情共鸣”。第三,要确保流畅地道,在语言表达、选词用句上邀请外籍专家改稿润色,尽量达到和母语人士的表达一样流畅自然,使外国受众产生亲近感。

3. 加强话语体系交互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外沟通一直很频繁,但在很多对话场合,双方仍然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层面,彼此之间没有有效的互联互通,在很多方面都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这就很难使中国话语与国外受众的审美习惯、接受心理一拍对路，更加无法达到知识同构、情感共振的效果。这就需要在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同时，要深化话语体系交流互鉴，搭建起中西有效沟通的渠道。

4. 提升对外传播效果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核心目的，是要将中国理论、中国观点、中国方案传播出去，传播效果的好坏是中国话语在国际话语竞争中是否能够胜出的关键。当前，互联网技术呈现裂变式发展，谁掌握了新技术新应用，谁就能抢占信息传播制高点，谁就能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和主动权。一要持续落实好“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要求，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充分发挥中央媒体对外宣介的集合优势，着力做到通讯社、报纸、电视、广播、网站、新媒体等不同载体的优势互补，在海外受众可理解、易接受的多元呈现方式和渠道上下功夫，积极打造错位发展、差异传播、相互借力的全媒体对外传播矩阵。二要适应新时代，拥抱新媒体，认真落实“用得好是真本事”要求，积极运用新技术和新手段，加快深度融合发展，努力把“最大变量”变为“最大增量”。三要注重青年导向，适应新趋势新变化，在努力全面覆盖西方政商学界主流人群、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同时，用好面向全球青少年传播的成功经验，打造文化传播未来工程。

5. 有步骤分阶段构建

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要以长远目标和当前任务相结合，有步骤、分阶段构建。党的十九大提出：“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①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也应与这一进程相一致，要明确当前任务是尽力把想说的努力说出去，对冲西方对我攻击污蔑，消化、化解、缓解西方话语霸权。具体而言，现阶段目标是主动设置议题话题，将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将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中期目标是中国话语音量分量与我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相符，在影响和引导国际舆论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彻底改变“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长远目标是全面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和主动权，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在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全过程中，紧密结合各阶段目标任务、加强战略部署和战术安排，以及谋划好每一步具体工作，成为必要。

作者系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对外话语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9页。